

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572頁。

在經歷安史之亂致命打擊後，唐朝國祚延續一百五十餘年，實現這一點所憑藉的，正是在內地普設藩鎮的做法。傳統看來，這一做法是唐廷「削弱自身統治、助長地方割據的一種行為」（頁525），但《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一書所要論證的，則是通過「建藩」以實現「削藩」，構建新型的「朝藩秩序」，是「帝國化解安史危機，甚至還包括帝國前期痼疾而採取的相當理性的舉措」（頁1）。雖然這種新構建起來的藩鎮體系和唐朝前期的節度使體制一樣，攜帶着某種毀滅性基因，最終造成唐朝解體，但就安史之亂後，這種亂後新體制的創建，卻生動反映了中央皇權應對地方離心勢力重新建立有效支配力的種種嘗試與努力。

本書調和了結構性分析和以行動者為導向的敘述的兩種研究路徑。作者聚焦於歷史進程，強調國家權威、政治制度以及軍事將領和地方性力量如何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局勢變化中，左右了事件的展開與走向。這些充滿變化而又彼此聯動的「事件叢」共同構成安史之亂後帝國藩鎮體制的演化、最終完成重構的歷史過程。這書就是對這一過程的深度細描。

由於論述重心在於中央皇權的重振，加之對地理因素的敏感，作者擇取四個與唐廷具有密切互動關係的空間關係展開論述，分別是河南、關中、河北和江淮。四個區域的歷史彼此交織、緊密聯繫，但分別來看，各自在相應時間軸上，確實展示了不同的重構歷程和特色，而其中差異，與不同的地理環境有關，更與各區域自身既有的歷史脈絡及其對於唐廷的空間價值有關。因此就書寫策略和結構來看，以空間為線索雖然付出了時間點與事件反復出現的代價，卻借此得以進入不同區域的深層與局部，使得論述更加細膩準確，闡釋層次也由此豐富起來。

除了考察河北的第三章論述時間向前追溯到武周時代，下延到唐朝末年，其餘諸章的核心論述時段基本集中於安祿山起兵至憲宗元和末年，以「元和十五年藩鎮空間版圖」（頁527）作為重構歷程的結點。作者通過歷時性追溯，展示了不同區域在走向這一版圖所經歷的不同經驗。

第一章「河南：對峙開始的地方」，首先考察唐廷與叛軍最先展開對決、也是對抗最為膠着的河南地區。論述圍繞幾個關鍵時間結點展開。首先是755年末，安祿山起兵攻下洛陽，地方官吏張巡僅憑一腔忠誠而成為持久

抗敵的主力，而玄宗、肅宗之間暗鬥及受江淮地區永王璘事件的牽制，導致唐廷官兵在數年內遲遲缺席這一戰場，亂軍長時間佔據主動。其次是759年，兩起事件先後發生，李光弼帥朔方軍南下主持戰事，安史亂軍內部安慶緒、史思明權力更迭導致田神功率平盧軍易幟南下，幾年後與侯希逸所率更大規模的平盧軍在河南地區合流。幾支力量共同匯於李光弼麾下，同時進行東西兩線作戰。再次是763年，代宗登基，史朝義自殺，安史之亂結束，瓦解勳臣重兵成為要務，而次年李光弼去世帶來了絕好契機。李光弼舊部被一一調離河南，使得這一地區被北來安史舊部平盧軍分而有之，形成淄青、汴宋、淮西三強鼎力的局面，延續整個代宗朝。在此過程中，762年舉州歸唐的滑州刺史令狐彰為這一僵局帶來了變數，772年令狐彰去世，代宗趁勢建立永平軍，派出文官李勉坐鎮，在河南地區確立起新型的朝藩樣板，唐廷進一步堅定了剿滅平盧軍勢力的決心。最後一個關鍵的時間點發生在大曆十一年（776），田神功去世後，汴宋屬將李靈曜政變，並聯合河北魏博軍，此事最終導致汴宋節度使解體的同時，使得淄青和淮西的進一步擴張，並為數年後德宗登基之初因強硬削藩而激起「四鎮之亂」埋下了伏筆。直到元和十二年（817）和十三年先後平定淮西和淄青之前，德宗和憲宗兩朝對於河南地區再未採取激進的壓制措施，轉而實行隨機立軍的策略，於是也使得這一區域出現鎮軍林立的局面。

第二章「關中：有關空間的命題」，重新回溯了中晚唐「京西北八鎮」格局充滿變數的動態生成史。不同軍力的出入構成關中地區嬗變與重構的主要線索，同樣突出展現為幾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其一是763年，代宗登基之初，吐蕃東擴，皇帝被迫撤離長安，宦官魚朝恩趁機主導京東軍事戰略空間的構建，並在亂後將這支以隴右邊軍與在陝兵為主幹的神策軍帶入禁中，培植壯大後再由禁中向京西北發展，逐漸布控出南北三條防禦線，與此同時，調兵防秋一舉也於此際出現。次年，澤潞李抱玉率兵入據鳳翔，馬璘率四鎮安西兵入據邠寧，加強京西北軍防力度。其二是777年，李抱玉去世，幽州將領朱泚率防秋兵進入鳳翔，而此前馬璘已帥四鎮安西兵移鎮涇源，將邠寧讓給河中而來的朔方軍，直到此時整個京西北地方依然由朔方軍所建立的政治網路所主導。其三是781年，德宗即位，郭子儀去世，唐廷得以順勢分解朔方軍，並完成對幾個重要軍事職位的人選更換，朔方軍之名號得以保留，並由李懷光接任節度使，但京西北整體局面在唐廷看來已大為改觀。這一舉措的順利推進激發了德宗的信心，以強硬的姿態應對河北、河南諸鎮的桀驁舉動，於是很快激起「四鎮之亂」，在調撥北軍南下平亂過程中，又先後發

生涇原兵變、李懷光叛亂等一系列事變，最終淮西李希烈也走向唐廷的對立面，直到貞元二年（786）李希烈去世亂局才得以告一段落。這一系列的危機衝擊唐廷的同時，也葬送了亂軍自身，關中地區此後神策軍一枝獨大，成為當地防禦體系構建的主力。

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異同」，作者希望重新檢討「河朔故事」的形成史，最終揭示出這一「故事」之形成，是唐廷經過地緣政治考量和經濟利益計算後的理性選擇（頁348-362）。承認河朔自立看起來是面對現實的被動接受，但亦不妨視為經過長期局勢嬗變、唐廷精細權衡後的主動選擇；畢竟主導河北局面發展的，始終是當地政治軍事精英。但作者強調，河北地區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的存在，幾乎安祿山起兵過程中當地就存在叛亂、勤王、自立等多股力量；而這一局面的形成，與河北地區自唐前期開始發展起來的多重軍事構造有關。安祿山軍團延續了這一性格，使得在動亂過程中，不同系統的兵力有不同的表現，這樣的差異也繼續保留在後安祿山時代的河北軍事格局當中，演繹成一系列區域性危機與重構事件，最終形成成德、魏博和幽州三強鼎力的局面，三者之間亦因為地理位置和軍力構成不同而各有差異。成德吸納了大量安史集團中的軍將，因此呈現以將帥主導、騎兵見長的藩鎮特色。魏博則在廣德元年（763）建鎮之初就注重培植牙兵，其力量逐漸增大甚至逐漸取代將帥主導了魏博一鎮的政治局面。幽州則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早就表現出地域主義的性格，特別是與東北部族的互動交織，影響了幽州地區政治局面的走向。河北三鎮的性格差異源於各自的地理和傳統，而這樣的差異也使得三者與唐廷之間發生不同的互動，並得以將衝突控制在彼此可以消解的範圍內，同時維持政治結構的平衡。

第四章「江淮：新舊交替的舞臺」，時間線索與前兩章是相呼應的。安祿山起兵之初，官軍在河南戰場缺席的背景，由本章永王璘事件的深度解讀與全景展現得到補充。760年宋州節度使劉展南下江淮變亂，而河北田神功率平盧軍南下平亂（頁434-443），開啟了平盧軍進入河南，填充當地軍力空缺的序幕。764年，李光弼去世後，其嫡系被召回京師，另有不少舊部轉而繼續南下進入江淮，十多年後，在建中初年「四鎮之亂」之際，柏良器建議在浙西組建鎮海軍，並推薦財政高手韓誇出任節度使，這支浙西兵在興元元年（784）李希烈叛亂危機最為險要的時刻，力挽狂瀾於既倒，成為拯救唐廷的中流砥柱。但和此前任何一支功勳卓著的軍力一樣，鎮海軍在貞元三年（784）韓誇去世後，不可避免遭遇了被肢解的命運。此後浙西再無大型軍團，元和年間李錡叫板中央的主要資本，是自己用錢雇傭的職業兵，而其轄

下的正規軍，經過作者鉤沉，則是貞元十六年（800）徐濠泗節度使張建封去世後，其屬將張子良帶入浙西的徐州兵（頁506），與李錡之間既無緊密的聯繫，自然也很難追隨李錡一道改變政治立場。

本書結語部份提到陳寅恪關於唐史輪廓的兩個精要論斷：其一，唐朝得以建立並強大，得益於建國之初所奉行的「關中本位政策」及圍繞這一政策凝結而成的「關隴集團」；其二，經過安史之亂的重創，唐朝之所以能夠延續，在於成功建立起「奉長安文化為中心、仰東南財賦以存立的政治集團」，後者被作者命名為「中央本位政策」（頁533）。兩點之間漫長的過渡便是本書集中考察的「危機與重構」的歷史過程。地緣政治和權力結構在此過程中發生了巨大變化，此前相對獨立的不同區域板塊在這一震盪過程中逐漸走向相互依賴、密切聯繫，但這並不意味着區域差異的磨滅，恰恰相反，在這一新型地緣政治空間成型過程中及之後，不同區域的地理、政治、文化脈絡差異始終發生着重要的作用。

整體來看，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重審安史之亂後以「建藩」而「削藩」的歷史進程及其意義。安祿山起兵所觸發的危機並非單向度針對唐廷，恰恰相反，從安祿山起兵一刻起，無論是河北地區還是叛軍內部，都已顯露出千頭萬緒的矛盾。在遣調不同區域兵力四處應對戰事過程中，不同區域內部的軍事成份不斷發生變化，使得消除舊矛盾的同時，不斷演生出新的矛盾。而所有的摩擦，都不儘然發生在中央—地方這樣的二元結構當中，四鎮之亂、涇源兵亂以及本書鉤沉出來的「幽隴兵亂」（頁169-178）等一系列危機，背後都涉及到軍隊的遷轉動盪，離開故地、喪失本營、沒有穩定的價值認同和物質基礎，成為動亂背後潛在卻實在的原因。於是，這些叛亂無一例外成為確定價值、爭取資源的行動選項，但震懾唐廷的同時，這種同歸於盡的手段實則葬送了亂軍自身，而這正是危機得以成為重構契機的原因。

以空間建立框架，在各個空間內部，作者緊密扣合歷史事件展開敘事，其中具體行為者的選擇往往扮演關鍵性角色。與其說安祿山起兵對唐朝國力造成巨大衝擊，毋寧說這場動亂真正打碎的，是既有的政治機制，雖然起兵本身正是這一政治機制病變的結果。秩序崩解所帶來的，是支配權威的喪失，制度和身份受到極大挑戰，個體才能由此變得格外重要。於是在結構性因素之外，我們看到眾多關鍵轉折，無一例外發生在「大人物」坐鎮與去世之際，帶來了「危機與重構」的契機，改變了區域態勢的走向。除了大人物，一些小型軍事團體及其領袖的作為，往往不易察覺卻至關重要，比如本文對永王璘屬將季廣琛（頁419-426）和李錡屬將張子良（頁503-512）的分

析，就非常精彩且有說服力。

如果不把安祿山起兵簡單視為一場危機，而看作是唐帝國重新安排和調整人際關係，醞釀新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起點，我們就會注意到，唐廷在這一過程中屢屢陷入軍事危機，卻始終握有相當的主動權。這一主動權實來自於並沒徹底淪喪的皇權及其象徵，職官或頭銜成為皇帝手中可無限量製造和派發的象徵性「貨幣」，這些「貨幣」不儘然可以收買所有人，卻對相當一部份人具有吸引力，特別是那些以「文」為業的官員。大曆七年（772）滑州刺史令狐彰去世前夕，上呈代宗一封「受恩則重，效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的遺表，皇帝覽此表後「嗟悼久之」，又將此表宣示百僚，「當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感歎」（頁64）。這裡沒有一兵一卒，卻讓我們強烈感受到了言詞的力量。令狐彰去世後設立永平軍，以李勉出任軍帥，開啟了文官出任節帥這一範式的先河。此後唐廷在培植軍備的同時，也格外注重以文辭重建意識形態網路。興元元年（784）在河南地區，唐廷和李希烈亂軍在漕運據點之一寧陵對峙，守城將領劉昌為唐廷苦守四十餘日，幾近絕望之際意外迎來江東鎮海軍的支援（頁90-91），在關中地區爆發了李懷光叛亂，成為神策軍得到進一步擴張的契機。這一年還有一件頗值一說而本書未提的事，那就是翰林學士陸贄操刀為德宗寫下〈奉天改元大赦制〉，並借國家資訊傳遞管道廣宣各地，澤潞節帥李抱真收到這一詔書後入朝，對德宗言，「山東宣佈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成為一次言詞化解軍危於無形的典型事件。這種文臣於白刃之際，「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的情形，在中晚唐「危機與重構」歷程中一再上演。因此，憲宗元和時代得以實現「中興」，自然是基於此前歷朝為其積累的軍事財政資本，但陸揚也提醒我們，「以往對憲宗平藩的研究過分強調其『戰』的勝利，而忽視了憲宗通過政治輿論而造成的『勢』的作用」（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58），後者正是本書時或閃現而未及深入之處，如本書提到河北成德鎮在晚唐呈現出鮮明的文質傾向，是時代風氣影響整個河朔地區的縮影（頁305-306），指出隨着削藩戰爭的勝利，朝命的官員，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鎮擔任節帥或幕府僚佐，這是唐廷重構藩鎮權力結構所獲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表現，還強調這些文官與文官節帥存在不同（頁534），在在反映出，在區域政治結構，特別是本文詳細分析的軍事結構震盪重組背後，整個國家官僚體系的重組在同步進行。這樣的官僚體系重構過程在不同社會情境下的表現，同樣取決於空間地理、社會身份和文化聯繫與價值觀等

因素，需要置於同一時段區域事件、社會關係、個人作為和民眾心理等交互作用中進行審察。

李丹婕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覃延佳，〈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建構：廣西上林師公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339頁。

20世紀80年代，華琛(James L. Watson)開始從民間宗教探討中國社會歷史文化過程的研究。華琛提出神明的「標準化」作為中華帝國晚期的文化整合系統，他認為這個系統強調的是神明的象徵和儀式實踐(行為正確)而非信仰。正是象徵與實踐這一結構的模糊性，為中國晚期帝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差異性提供了空間。隨後許多歷史學者、人類學者加入了這場討論，對華琛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和修正。覃延佳的《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建構：廣西上林師公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一書就是由此出發，通過考察廣西上林地區的師公——地方儀式專家——的能動過程，開展歷史人類學研究。通過對廣西上林地區師公的神靈譜系、儀式過程和儀式文本的討論，解釋師公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的相互建構。

在導論部份，作者從中國宗教與社會結構性問題、道教的儀式研究取向和民間儀式傳統的正統化與多元性這三個方面對前人的研究做了詳實的梳理，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從特定儀式專家的儀式及其文本來分析其儀式傳統，尋找儀式專家自我區分的內在邏輯，從而從更加多維的視角來闡釋民間儀式專家之儀式傳統在區域上的相對統一性與多元性。」(頁11)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借助社會文化史學的反思視角，通過田野調查收集資料，將師公儀式傳統的承繼與建構放入具體的歷史情境和儀式情境中去理解，並發掘其與地方文化的關係。作者還介紹了撰寫本書的基本思路、所運用的材料及簡單的分類，以及全書每個篇章的內容簡介。

在第一章，作者選取了在上林地區具有重要地理意義的西燕鎮四個影響較大的師公班作為對象，對他們自清末以來的師承譜系進行了分析，比較了他們之間的異同，追溯師公進入這一區域的歷史，闡述不同師公班子之間的傳承與重構，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師公認同與區分。最後，作者還將師公